

# 科幻与帝国

文 / 小伊斯特万·西西塞里-罗奈 著

周忆粟 译

黄亚菲 校\*

**摘要：**本文初步尝试构建新的认知地图，将科幻文学视作受技术科学帝国世界观启发的帝国主义产物。历史上主导科幻文化的通常是那些进行过帝国扩张的国家，如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与日本。科幻兴起的条件由帝国主义和技术共同确立，两者都在殖民征服和政治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还认为，科幻充斥着作为全球技术科学体制的帝国神话。科幻隐喻着显诸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中的一种世界模型，因此本文将《帝国》当作准科幻文本（quasi-sf text）及地缘政治神话，而非仅是分析政治的作品。

## 引言

笔者将于本文中绘制一幅认知地图，以考察科幻如何反映源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型，以及科幻如何被单一全球技术体制的理想所激发和演变。我认为科幻作为文类的兴起，有以下三个前提

因素：一、推进实际帝国主义的技术扩张（technological expansion）；二、国家受众在其社会从历史上的传统国家转变为霸权国家时对文学-文化中介（literary-cultural mediation）的需求；三、实现技术科学帝国的幻想模型（fantastic model）。

简单罗列过去一个半世纪最盛产科幻

\* 周忆粟，现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系礼任副教授，教育博士项目课程主任，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理论翻译工作，长期从事科幻文学研究。

黄亚菲，重庆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科幻文艺。

作品的国家，就能看到一种清晰的模式。

主导科幻发展的国家都恰好曾意图借助帝国主义来扩张国土面积，即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和美国。<sup>1</sup> 这个模式虽明显，却并不简单。英法两国科幻兴起的时间正值其帝国主义扩张全盛期，并且在两国的殖民地独立后仍长期处于繁荣之中。<sup>2</sup> 德国科幻主要源于魏玛时期，即短命的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sup>3</sup> 当前国际影响力巨大的日本科幻在“二战”结束前产出也不多。<sup>4</sup> 苏联科幻汲取了俄罗斯丰富的讽刺和神秘科学幻想传统，并在1920年代将其改造以适应自身的革命神秘主义（revolutionary mysticism）；苏联科幻随后长期停滞，又在1960年代的解冻期再次复苏。<sup>5</sup> 在美国，科幻早在19世纪就已是成熟的小众文类，并于1920年代开始爆发式增长，自此便始终处于霸权（hegemony）地位。它兴起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衰败期，抑或是可以

被视为美利坚帝国象征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中，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解答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幻文类在20世纪文化史中的功能，并更敏感地体认这一文类如何协调民族文学传统与奇美拉式怪物般的全球技术文化。

要深入探索该问题，我们必须对一些难以界定的概念有明确的了解。我们在此讨论的“科幻”，指的不是包含假想社会或美学逻辑的理想范畴，而是各国受众所理解的科幻（what national audiences understand to be sf）——这与其说是一种严格分类，不如说像一滩形态不断变化但总质量保持恒定的凝胶（jelly）。科幻文类中的核心元素普遍存在于各国科幻文化之中，并由此形成了读者能够体认为科幻的国际原型，但对该文类“边界”的划分却有很大差异。<sup>6</sup> 我们还应当记住，由于起始时期、本土文化特点与物质技术关系

1 该模式的重要例外情况是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所在的中欧地区。奥匈帝国亦可能有其特殊地位，它最北边的城市，也就是莱姆所在的克拉科夫（Krakow）就是如此。

2 关于英国科幻的概述，可以参阅斯塔布尔福（Stableford）、格里菲思（Griffiths）和格林兰（Greenland）的著作。关于法国科幻，可参考洛菲西埃（Lofficier）的作品，更为特立独行的高安维（Gouanvic）、波泽托（Bozzetto）的文本，以及《科幻研究》中关于法国科幻的专号（1989年11月第16卷第3期），但关于全面述介法国科幻的严肃英文著作尚未出版。

3 德国科幻可以参见费舍尔（Fischer）、费希尔（Fisher）和纳格尔（Nagl）的研究。

4 关于日本科幻，马修的资料并不翔实；可以查阅内皮尔（Napier）关于动漫的研究，以及《科幻研究》杂志关于日本科幻的专号（2002年11月第29卷第3期）。

5 若想了解苏联科幻，可以参考赫勒（Heller）、格里菲思（Griffiths）和努德尔曼（Nudelman）的作品。

6 关于“原型效应”如何应用于科幻的讨论，详见斯托克韦尔（Stockwell）的著作第6-7页。

的差异，不同国家文化中的帝国主义计划各不相同。我把此问题视为一种复杂演变过程，由起源于国家整合、现代化扩张计划的帝国主义——怀有一种天真的信念：外部领地附属于民族国家并不会改变宗主国——一直演变到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著作《帝国》中所描述的后现代帝国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状态。我将论证，科幻的驱动力来自于一种欲望，即通过想象中的转型将帝国主义转化为帝国<sup>1</sup>，这种转化不是以卡特尔或民族群体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为主，而是被视为一种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这种体制影响并确保了过去国家化通信的全球控制系统（global control system of denationalized communications）。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成为帝国主义所幻想的潜在力量（fantastic entelechy），一种超越了（通往这一目标的）国家竞争的理想境界。

对多数评论者而言，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辩解——为一个民族国家寻求拓展其力量至其他脆弱疆域提供解释，同时该国还与其他追求相同目标的国家竞争。与此相对照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代表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对民族国家的权力造成了致命的限制，并通过全球治理和交易的机构、信息技术以及美国实际上的军事统治来维持自身。

我并不关心哈特和奈格里的模型是否精确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实际状况。<sup>2</sup> 他们的论点正被目前的现实检验，因为美国所追求的征服，至少在试图达成“全球冲突管理”目标的程度上也类似于经典的帝国主义。时间将会告诉我们这一努力是否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哈特和奈格里理论极度依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概念，抑或是否戏剧性地扩大了美利坚帝国执行“世界和平”的势力范围。在我看

1 译注：由于在英文原文中，凡是呼应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的地方，作者都用了大写的 Empire，因此本译文中把对应的“帝国”都替添加了着重号“帝国”，以示区分。

2 关于《帝国》的批判参见：Kevin Michael, “Non-Dialectical Marxism of Hardt and Negri”, *Theory/Practice Newsletter* (April 2002) <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2/April/essay\_apr02.htm>; Tom Lewis, “The Empire Strikes Ou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24 (July–August 2002) <www.isreview.org/issues/24/empire%20strikes%20out.shtml>; Timothy Brenna,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Critical Inquiry* 29 (2003): 337–67; Louis Proyect, “Hardt–Negri’s ‘Empire’: A Marxist Critique” <www.columbia.edu/~lnp3/mydocs/modernism/hardt-negri.htm>; Gopal Balakrishnan, Hardt and Negri’s Empire, *New Left Review* (Sept.–Oct.2000) <www.newleftreview.net/NLR23909.shtml>; Jon Beasley-Murray, Lenin in America. *Rethinking Marxism* (Sep. 2010): 149–154.

来，用哈特与奈格里的观念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据很薄弱。但是，它确实是理解当代地缘政治神话的有用工具，如詹姆斯（Fredric Jameson）所言，是当代的一幅认知地图。它巧妙融合了跨国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观点所共享的全球化关键概念，并且由此描绘出了一幅想象的世界图景。其中，基本的历史变革被概念化和合理化了。作为一个政治模型，他们的观念带有科幻风格——从而进入了包括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Guattari）的拓扑理论在内的其他政治性的科幻神话。<sup>1</sup>作为世界模型，它既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又是体验世界的方式。它也是彼得·斯托克韦尔（Peter Stockwell）所说的“总纲文本”（architext）：包含读者对现实的认知以及科幻作品众多差异的整套复杂认知隐喻——也就是科幻文类共享的作品和假设。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观念与乌托邦类似。我将指出乌托邦这一总纲文本与

帝国模型紧密关联，并且通过将真实帝国主义视作想象帝国与日俱增的困扰，来凸显科幻小说中的这种关联。帝国即是帝国主义的潜在力量（entelechy）、内在目标（embedded goal）以及观念实现（conceptual fulfillment）。

## 一、科幻与帝国主义

技术在推动帝国主义计划中的作用经常被忽视。<sup>2</sup>然而事实上，技术进步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家地理扩张的必要前提，更是其内在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引发意识变化，而正是这种意识变化促使宗主国征服欠发达文化，建构相互融合的技术管理网络，并设立不可避免走向种族和民族至上神话的“客观测量标准”<sup>3</sup>。因此，科幻这一文类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诞生就显得合情合理，毕竟在这些社会里，技术已经成为主宰环境和社会生活的系统。帝国主义国家正位于技术革新的最前沿。这些国家的计划具备了托马斯·P. 休斯（Thomas

1 关于将鲍德里亚和哈拉维视为科幻作者的讨论，参见西西塞里－罗奈的 *The SF of Theory*。

2 阿达斯（Adas）和黑德里克（Headrick）是有关此类研究的例外。

3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1989, p.145.

P. Hughes) 所描述的“技术动量 / 势头”(technological momentum)<sup>1</sup>。探险或强制造就的系统,就如同殖民地的管理与生产催生出的系统,这些系统渐趋融合。殖民地被当成自由试验田。在那里,公司和官僚机构得以在远离本国保守民众制约的前提下测试新技术和仪器。随后,这些革新反哺宗主国,带来了更多投资、更精细的技术和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机械生产的指数级增长和机制的不断创生拓宽了帝国代言人及其属民之间的鸿沟。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这一技术体制功能的体现<sup>2</sup>。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持续加速的技术革新,帝国主义不可能如此强大,也不可能进展如此之快。没有蒸汽船和炮舰、连发步枪和机关枪、海底电缆、电报线和抗疟疾药物,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将被大大削弱,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存在。<sup>3</sup>然而帝国主义技术不仅仅被用作殖民地的剥削工具,帝国的未来震荡反弹回殖民国,巩固了与技术动量关联的政治权力新观念。这种震荡以让所有抵抗徒劳的速度发生,从根本上也殖民了殖民国本身。每一项全球技

术上的成功都为技术项目带来了权力与资金,从而创造了一种相互推动的效应,促使非理性的政治和经济剥削超越其界限,进行大规模的、不受控的社会实验。同时,这种势头也使得技术动量被急剧中心化与复杂化——直至国内外的社会冲突看上去唯有通过技术手段才能被政治管理。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政治被技术化了。

我们不妨从文学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观点。小说被公认为树立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工具,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名观点,小说是正在现代化的社会构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手段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也提出,由于现代化遵循单一的历史轨迹,小说在各个民族文化中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一个社会要么处于变革的列车上——而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正是位于火车头——要么就被蒙在了车后扬起的尘土里。小说基于某些集体记忆和神话以本国通俗语言创作这一点,对卢卡奇而言似乎无关紧要。研究西方小说的学者们却无法忽视,小说一直

1 Hughes, Thomas P. "Technological Momentum."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Ed. Merritt Roe Smith and Leo Marx. Cambridge, MA: MIT, 1994, 101-13.

2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1989, p.134.

3 参阅黑德里克的著作。

以来也被用于巩固与确立民族性。小说是试图调和至少两种强烈的文化愿望的尝试：一方面是保存一个社会当前现状的独特知识、语言和集体记忆（巴尔扎克称之为“现在的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the present]），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晋升至世界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体，渴望加入处于历史进程前列的国家俱乐部。

如果文学类型的流行标志着它通过虚构方案调解真实社会困境的能力，那么科幻文学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调解了什么，又是如何进行调解的？科幻常常与小说传统中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它与众多反现实主义进而反资产阶级的文学类型联系在一起（常见的比如牧歌、罗曼司和乌托邦）。在美国，科幻小说最初主要受到资产阶级以外的边缘群体的热烈欢迎：新移民、蓝领和技校学生；对他们而言，物理控制幻想以及工程知识提供了区别于中产阶级既有规范的形象性社会权力<sup>1</sup>。而在魏玛时期的德国，

科幻则主要面向中产阶级，他们关注的是民族恩怨和复仇幻想<sup>2</sup>。在这两个案例中，科幻中“幻”的部分和那些激励帝国主义冒险家和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惊人地相似。历史学家把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慨叹视为帝国主义欲望的极致表现：

世界几乎已全被瓜分，剩下来的也正在被分割、征服和殖民化。想想夜晚你看见的头顶上这些繁星，这些我们从未到达过的广阔世界。可能的话我要吞并这些星球，我经常这样想。看到它们如此清晰却又遥不可及，令我感到悲伤。（引自哈特和奈格里 221/217<sup>3</sup>）

改写一下菲利普·K.迪克笔下帕莫·艾德里奇（Palmer Eldritch）的话：帝国主义承诺献上群星，科幻小说实现了它。<sup>4</sup>

我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已经取代了资产

1 Peter Stockwell, *The Poetics of Science Fiction*. Harlow, UK: Longmans, 2000, p.99.

2 Nagl, Manfred, "National Peculiarities in German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as a National and Topical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8.1 (March 1981): 29–34.

3 译注：《帝国》一书有成熟的中译，因此本文中取自这本书中的内容都直接引自杨建国和范一亭译本（2008年全本，之前的版本缺少了《间奏》部分的内容）。此处页码标记为“原文页码/译本页码”，原文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处援引的罗兹，是著名的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他曾出任英国开普殖民总理（Prime Minister of the Cape Colony），是钻石公司戴比尔斯的创始人，也创建了著名的罗德奖学金。罗兹是英国的鼎力支持者。

4 译注：PKD的原文是“God,” Eldritch said, “promises eternal life. I can do better: *I can deliver it.*”。

阶级现实主义，成为西方晚近现代主义民族文化的主要调解媒介。那会是个过于宏大的主张（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提出的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个更广泛、包含科幻小说传统元素和世界观念的幻想文学类别，结合了资产阶级现实主义、非西方的幻想、空想讽刺和科幻，如同一种“滑流”小说 [slipstream writing] 的写作<sup>1</sup>，那么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sup>2</sup>）。怀揣技术官僚梦想的读者群体并没有全面取代资产阶级的民族性公众。如果说科幻小说在调解民族历史和晚期现代的“未来现在”（future present）之间扮演了某种角色，那么民族传统在科幻文化工作中又有何功能？

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研究中，研究帝国主义的学者们明白了帝国扩

张对宗主国文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哪怕在当时这种影响几乎不被察觉。大多数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近期仅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统一在许多情况下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的内在冲突仍然活跃且有威胁。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将国内问题输出至国土边界之外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这些“外部世界”（offworld）殖民地社区的建立，他们对宗主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们要求宗主国放弃与民族国家相伴生的某些限制，并适应被殖民地的“事实”：技术手段的暴力被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当化<sup>3</sup>。这种正当化以及对技术暴力的依赖腐蚀了民族国家最积极的制度和价值观，其腐蚀程度在一战中达到顶峰，彼时宗主国试图将其在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成功复制到欧洲旧世界（Old Earth of Europe）<sup>4</sup>。在那一刻，角逐中的欲成帝国（would-be empires）

1 译注：slipstream writing 是一种泛写作类型，根据布鲁斯·斯特林，“这是一种让你感到非常奇怪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有某种敏感性的人，生活在 20 世纪末会给你的感觉”。

2 麦克海尔的《后现代主义小说》（*Postmodernist Fiction*）一书中提出，后现代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优势（以侦探小说为典型），转而采用本体论优势（以科幻小说为典型）。作者在《建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中更深入地讨论了科幻小说的特点，将赛博朋克标志为后现代流派的精髓。而我在《一份精心建议》一文中认为，科幻小说实际上并不关注本体论，因为它设想的诸多世界被视作科学唯物论的单一的，尽管是多样化且极其易变的世界的一部分。“科幻文学里的”世界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科幻小说认为它们虽然要么是被创造出来的，要么是被发现（因而已被理解和掌握）的，但都通过技术实现。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取科幻小说，而是奇幻作为时代的主题，麦克海尔关于后现代主义本体论优势的观点将得到加强。奇幻小说及其各种滑流混合体不需要对虚构世界的状态做出任何本体论决定。（参见我在本期对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的马克思主义和奇幻问题评论。）

3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1, pp.136–138.

4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1989, pp.356–366.

彼此碰撞，他们意识到自身的技术系统（technosystems）比历史更深刻地决定了自身的特征。因为殖民者拒绝接受对他们自由的限制，其民族传统也不能扩展至外层行星。对于罗兹这样的冒险家，国旗不过是进行帝国主义积累的资产；对于宗主国内部的人民，国旗则代表着支撑帝国主义积累的核心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者而言，只不过证明了民族身份是变数极大的投资工具（a volatile investment instrument）；而对国家民众而言，这却灾难性地颠覆了现实政治的本质。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科幻提出了一些极具针对性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科幻文学在不同国家传统中的差异，是否主要是由人们希望保留在抵御科技扩张这台强劲引擎的历史中确立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愿望所导致的？这是否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到法国科幻和英国科幻、美国科幻和德国科幻、日本科幻和俄罗斯科幻之间在作品基调、文类归属、表现手法上的显著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幻小说可能与现实主义小说在资产阶级民族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它负责指导“本国”文化向“全球”文化进行抽象的技术-政治跃迁，从众多国家之一成为全球文化的

一部分。

另一个问题是：科幻小说成为易被识别的文学类型，是否因为沉迷科技要素？（可能类似于电影成了特殊的物质媒介），是否被用于展现和表达帝国主义过程的辩证法？是否正通过将技术渗透进民族文化的“方言”中——即符号系统、文学形态和公式、艺术技巧和话语实践——从而努力管理帝国主义所固有的技术势头？

为了探究这一谱系，我们至少需要将以下三个领域联系起来：

1. 帝国时刻的本质——帝国的扩张是如何影响其性质的？是一个缓慢而有序的过程，正像英法帝国那样；还是短暂、激烈、高度人为且自省，如同德国和日本；或者是如同美国般平顺地增长经济和军事实力？

2. 科技文化的性质——它是否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扩散，像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那样；还是像在日本那样被视作外来输入；或者它是否与俄罗斯和苏联革命的神秘主义相连；抑或是德国浪漫的渴望和感情上的不满的表达呢？从实现帝国的后视镜里，一种特定的科技文化扮演了什么角色：主导力量、边缘化的后来者、敌对的反帝力量，还是历史的扬弃？

3. 最后，影响科幻创作的文学－文化传统的特征。这是科幻文学的无意识领域。民族文学或艺术形态可能指引我们认识到不同国家的科幻风格独特的传统。显然，科幻小说通过它所使用的符号很容易被读者辨认：飞船、外星人、机器人、超级武器、生物怪兽，以及近期新增的虫洞、网络、赛博格等。将这些符号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为联系起来并不复杂。它们象征着帝国主体的权力工具、统治对象的改变，以及那些发现自己分裂忠诚主体的矛盾性。这样说，科幻符号成了文化中立的现代普遍抽象象征。然而，当我们接触不同国家风格的科幻作品时，我们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异。同样的符号在苏联科幻中以政治及梦幻的形式出现；在英国科幻和它幽默滑稽的《红矮星号》（*Red Dwarf*）中被塑造为科学罗曼司；在法国后凡尔纳时期的幻想风格科幻及其令人眩晕的《金属风暴》（*Metal Hurlant*）阵营中被演绎为奇幻的讽刺超现实；在德国科幻及其好战的环保科幻子孙中体现为浓烈的民族浪漫情怀；在日本科幻及其隐藏的偶人戏传统中表现为世界末日情景；而在美国科幻和它带着反抗资产阶级情绪的技术黑暗派对风格中表现为跨星系的爱迪生式问题解

决风格。这些当然是粗略的勾画。民族风格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演变，并且持续处于国内外影响的变化之中。也有清晰迹象表明，这些风格正在趋于融合——由于奈格里和哈特所分析的全球资本主义对多样性的欣赏。

## 二、科幻与帝国

如果我们仅从历史帝国主义的角度审视科幻文学与技术科学帝国（technoscientific empire）的联系，我们会看到一副外骨骼（exoskeleton），即该文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演进压力与国家技术文化之间的交界面。要采取真正辩证的观点，我们还必须审视该文类的内核空间、世界模型、概念设计假设，以及它通过概念设计假设来使政治、社会、本体论和技术科幻化的方式。我认为，这个想象中的世界模型是技术科学帝国——一个被管理、维持、正当化，同时也被交织和竞争的社会控制技术与物质扩张技术撕裂的帝国。科幻艺术家描绘了这样的故事：这个帝国为何被渴求，它是如何实现、管理，又是如何败落（因为它终将如此）、衰退和崩溃的，帝国如何处理对相互争夺的帝国主权的申诉，或者

帝国如何被抵制。科幻小说的历史反映出不同国家读者处境的转变——通过想象自身如何在由技术的第二天性所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体系中变化。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简略地考察一下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帝国特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首先事关“无限的增长”。这表现为资本、市场和生产的无限扩张；帝国则同样关注对过去扩张成果的巩固，并被“帝国秩序”强烈吸引。帝国的扩张不是受到贪欲或民族自尊心所驱动，而是源自帝国秩序在提供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声称的优越能力。

帝国努力构建了统摄一切的单一力量，这一力量并非基于某块具体领土，而是根植于抽象的正当性意识形态，并被控制技术所保障。帝国的典型空间是广阔无垠且边界模糊的；它穷尽历史时间，并将其悬置，根据需要从过去与未来实用地（或可以说是按一种讽刺的方式）选取合理化的原则。帝国的目标在于管理全球冲突，追求“世界和平”。帝国通过处理局部危机，甚至通过将全球性的挑战转化为行政层面的冲突来不断自我更新、强化。它规

避了辩证法和超越性（这些特质本质上会导致不稳定），而是倾向于不断介入。它既介入社会世界，也介入个人的私密思想，借由渗透性的通信技术将这两个领域融为一体。它的物理空间无限，永远向外扩张，它的社会空间则对多样性、混合性和无休止的失真过程敞开。帝国是自然被人造完全取代的缩影。在它的本体论中，所有存在都源自一种单一却变化万千的内在本性——尽管从规则上它允许无尽的例外，但决不容许全面否定。

帝国是暴力与合法性的融合体。它将“秩序”视为根本价值，因此其核心动机是执行与施行。它的律法不源自神的旨意，而是来自科学。这些法则在全球层面被理论化，但却以例外的形式在地方层面得以执行。技术贯穿帝国的每一处，构建了一张权力之网以分配其力量，并将通信线路进一步转化为权力线缆。<sup>1</sup>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帝国通过炸弹、金钱和以太进行统治。它的权力中枢是我们所熟知的作为全球城市的神经网络节点。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哈拉维所说的生物政治虚拟领域的特殊场所加入其中：基因、胚胎和实验

1 译注：此处是一语双关，power grid 与 power cord 也是电力网和电力线的意思。在此处以及下文，作者多次把力量 / 权力 / 电力（三个词的英文都是 power）做了调换。

室——分布式的交界面，在那里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与无限物质扩张之间的根本冲突不断展开。

作为一种设想中的政治领域，帝国让人联想到乌托邦。乌托邦构建了一幅城邦国家乃至民族国家的理想化蓝图，其特点是内部冲突由于权力与法则的高度吻合而不复存在，这种完美的一致性被视为一种本体论的先决条件。乌托邦利用其秩序所体现的无可抵抗的逻辑消除了内在分歧和差异。在空间上，它们是封闭的，因此容易维持其居民身份，并加强他们的自我认同。乌托邦的统治力量（hegemony）可能会延伸到城墙之外，但本质上依然与外界隔绝。乌托邦不扩散，所以它们的稳定依赖于对自然平衡法则的严格遵守。它们之所以既科学又理性，是因为其法则体现了自然理性中固有的稳态逻辑。

帝国的模型植根于现实帝国的历史。乌托邦出自一种对社群和自然和谐的抽象融合，而帝国则由更实际的力量与权力的结合所激活。即使在其最理想化的形态中，帝国仍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它分发——并由此生产——力量（power）。在乌托邦中，力量有时会被理论化为一种保护个人与国家平衡、确保独立领土不被侵犯的手段。

在帝国中，力量则是维持活力的可能条件。帝国民众的所有社会性与创新性的努力都充满了制度性暴力的影子，这暴力使得这些努力得以成型。帝国暴力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不得不进行扩张；若尝试限制，其社会结构将如同黑洞般坍缩。

科幻深受乌托邦影响，但其实它与帝国的关系更密切。科幻中的技术科学——是其符号、能量和假想历史冲突的基础——和乌托邦中制度化的平衡措施与遏制策略并无关系。技术科学计划不断扩展，与其他计划交织在一起，并从那些激发新解决方案的大规模冲突中获取力量，随后演化为新的机制。技术科学的发展既是内部的（遵循其技术适用性和优化的逻辑），也是外部的（遵循普适性逻辑）。就像一台追求最大相关性的引擎。通过暴力克服由“自然”设下的障碍（这“自然”不过是帝国技术作用前的原始世界），技术科学以其不可抗拒的扩张性暴力来申索自己的权力和法则。然而，这种力量是以实现和平与秩序的名义被正当化的。

在军队和行省总督存在之前，技术科学帝国更青睐那些冒险家，那些远离家园、技艺高超的现代奥德修斯，他们对运动和冲突的渴望催生了能工巧匠般的技能。

每一场战斗和每一道被解决的社会技术难题，都让这些帝国的工匠获得更多的个人主权和权力。当帝国在局部制造不断的冲突以邀请自己介入时（哈特和奈格里将此过程称为“无处不在的危机”[189/191]），帝国小说开创了在一个充满内在可能性的平行世界的冒险。科幻便与这样的帝国冒险世界最为契合。

哪怕是与科幻故事常有渊源的传统类型（如牧歌、罗曼司、乌托邦城市景观）也都源自帝国的想象力（具体来自亚历山大、拜占庭和罗马），它们的亚类如奴隶叙事、穿越地狱以及暗城，也是如此。乌托邦需要具体的场所、定位和定义；按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的说法，它们是空间的游戏（games with space），是为虚构地域绘制的真实地图。而帝国则恰恰相反，在空间上它没有边界，在时间上也从不安宁。帝国是一个永恒的、被管理的过渡模型：它的世界永远处于帝国发展时间线上的某个节点，经历初始扩张、融合、败落，到衰退和坍塌。

围绕这一美丽的政治神话，我们本可以述说更多。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足以发现这个想象中的技术科学帝国对科幻小说的丰富贡献。这一文类所钟爱的反事实操作和机制，都在帝国本体论的合理性中获

得了解释。时间机器、超光速旅行、银河历史、平行宇宙、中心与边缘间关系的持续重建——在老地球与殖民世界的关系，在外星人、赛博格、太空歌剧，在理想国与异托邦里——这些主题，和科幻小说中许多其他主题一样，依赖由技术科学的法则和权威治理、却又对无限的变化开放的宇宙。科幻小说就像一台无穷尽的局部危机生成引擎，永远无法真正地离开那个极为包容的宇宙。

哈特和奈格里所描绘的帝国模型给人一种鲜明的科幻小说气质。虽然波利比乌斯、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影子仍在背景中徘徊，但当代的帝国倒让人想起了我们熟知的赛博朋克和黑色技术风格的世界。

帝国看起来就像一部技术含量极高的机器：它是虚而非实的，建造它的目的是控制边缘事件，组织、支配系统的分解，必要时进行干涉（这与技术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

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

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

这就是帝国的蔓生 (Sprawl)<sup>1</sup>，在这里的统治不是依靠法令和军队（好吧，至少大部分不靠军队），而是通过通信/控制网络分发虚拟力量来实现的。这种力量就像植入大脑的芯片一样，被帝国公民深深内化了。在帝国里，主体性呈现多中心分布，它由那些本身就岌岌可危、时刻处在崩溃边缘的体制所制造。随着学校、家庭、法庭、监狱这些社会机构的稳固性破裂，与之相关的明确的主体角色也随之弱化，人们对帝国整体性的追求愈发强烈，开启了一个全面的意识形态，一种精细分布的实用神话，一套网络化的、全球性互锁的力量。这是菲利普·K. 迪克、J.G. 巴拉德、威廉·吉布森、帕特·卡迪根和押井守笔下的未来一瞥，计算机通信系统全天候运转，创造出一幅被消费主义占据的心灵景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灌输其中。就像在卡迪根的小说中那样，它不断地分解并重构人类意识，把人们暂时性地塑造成目标身份，在复杂多变甚至自相矛盾的形式中不断地出售和转售对完整性的

乌托邦式怀旧梦想，并且这种梦想不断地深入那个曾经认为自己是主权者的自我之中。在这个帝国里，虽然投射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现实却只有一个。

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世界看上去以政治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市场是全球的，而权力则被组织起来，贯穿在这种普遍性当中。帝国的政治体现在其全球扩张性之中——只有风和气流可以吹动的一片瀚海。超验想象的中性化于是成为首要的感觉，即帝国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是本体论的。

在当代，帝国的权力并非自某个中心辐射出来，而是源于后现代都市中网络化的神经联接。因此，抵抗并不表现为直接对抗，而是通过“群众”在日常生活拒绝服从命令来体现。对哈特和奈格里而言，革命既无法实现，也并不被期待，因为没有任何阶级有能力成为历史的自觉主体。在吉布森的世界里，获得自由也意味着发现事物的新用途。与国家现代主义时期的破坏策略相比，帝国中的抵抗表现是撤回乃至离弃的同义词。即便是最伟大的叛逆者，也只是拒绝加入的人，他们选择离开，

1 译注：“Sprawl”是吉布森的蔓生三部曲，即《神经漫游者》《零伯爵》《重启蒙娜丽莎》。

并留下“一切仍是一切”的世界(270)<sup>1</sup>，正如《神经漫游者》(1984)中融合在一起的人工智能所做的一样。虽然这种策略看似对帝国形成打击的力度有限，但在反文化“迷失在太空”(或者说“迷失在都市迷宫”)亚类中却是一个突出的主题。(讽刺的是，《迷失太空》[电视剧，1965-1968；电影，1998]本身就像《鲁宾逊漂流记》一样，是非常保守的。)尽管在表面上帝国模型接受了网络式的层级化管理——比如星舰指挥官们依旧代表联邦——连主流流行作品如《星际迷航：航海家号》(1995—2001)和《遥远星际》(1999—2003)也在无人涉足的领域中试图建立去中心化的关系网，而借助虫洞，人们可以轻易地从过去(以及帝国的政治)穿越过来。

帝国与科幻的相似性甚至扩展到形式层面。比如连续剧的形式特别适合帝国科幻。它允许将大量元素进行并置，而不需要多少动机。在每一集里，我们又将处理一出关于空间或时间混乱的文化隐喻。从最早的《飞侠哥顿》到后来的比如《星际迷航》和《遥远星际》都是如此。连续剧

允许外星元素和本土元素相互认可，而不至于威胁现有秩序。例如在《星际迷航》这样的作品中，无垠的宇宙空间通常通过递归和概括的形式被控制——这些都是情节工具(plot devices)，显示远方的诸多差异实际上与地球宗主国的永恒问题息息相关。科幻在它最智识的表现中，甚至能够将自然法则想象成人为，作为权力展现和交流的工具——例如莱姆在《新宇宙演化论》(*A New Cosmogony*)中所阐述的，宇宙超古文明改动宇宙基础法则以便进行交流(并且阻止人类威胁到它们的霸权)。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反映了它诞生的时代，这个模型呈现的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迅速成形的全球资本主义图景。他们的观点本质上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变体，略带马克思主义色彩，聚焦于后福特时代的国际服务经济，以及由计算机和机器人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两位作者对于除通信/控制网络之外的技术鲜有讨论。在他们看来，技术意味着控制，即“帝国机器”。他们的历史帝国主义观念同样忽略了技术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断地冲垮了民族国家的防波堤，创造出全球流动

1 译注：此处采用的是读客的译本，来自芬兰人和凯斯的最后对话。凯斯问：“然后呢？一切会有什么不同？现在是在你在操纵这个世界了吗？你变成了上帝？”芬兰人说：“一切没有不同，一切仍是一切。”

性不断变化的通道。从科幻的角度观察，《帝国》属于一个特别的亚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治理科幻”（sf of global management）——它不仅与赛博朋克有亲缘关系，还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Foundation*, 1951—1953）、詹姆斯·布利什的《飞城》系列（*Cities in Flight*, 1955—1962）以及《星际迷航》有着相通之处。

科幻的帝国想象力更为全面。由于科幻的核心前提假定了技术科学本体论无所不在，因此它试图想象任何可能影响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技术所带来的结果。这不仅包括目前已经运作的通信 / 控制技术的近期应用，也包括那些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物理现实基本认知的技术科学，例如纳米技术、超光速太空旅行、基因工程等。从历史上看，科幻作者唯一设下的限制规则是，故事中冲突的双方必须以技术来考验其最高权威的基石。这种冲突有时候是很直白的，就像在那些堂而皇之的帝国科幻中那样。在其他各式各样的作品里，无论是 H.G. 威尔斯的《世界大战》（1898）、《地球停转之日》（1950）、《飞碟入侵地球》（1956），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965），还是乔·霍尔德曼的《千

年战争》（1974），《星球大战》（1977），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1985），布鲁斯·斯特林的《分裂矩阵》（1985），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1990），厄休拉·K. 勒古恩的《瀚星》系列和伊恩·班克斯的《文明》系列小说，我们都可以看到技术霸权间的角逐。不管他们的差异有多大，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深，他们都在同一个社会 - 本体论连续体里（social-ontological continuum）展开对抗，其最显著的特质是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能够创造技术文化，以此来操纵和扩大对他们所处世界的权力。

在继承了儒勒·凡尔纳精神的“人类对抗自然”类型的科幻中，英雄式的主角们靠他们的知识技能应对随不利自然现象而来的问题。有时，就像大多数灾难片中那样，他们最终能够获得胜利；但有时，他们可能会败给物理宇宙的强大力量，如阿卡迪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的《遥远的彩虹》（*Far Rainbow*, 1963）和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日本沈没』，1973）中所描绘的那样。不管结果如何，每次的挑战都是对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所从事的技术科学活动的韧性和成熟度的局部测试。即使在某些彻底反技术的故事中，

哪怕技术科学帝国像奥兹曼迪亚斯那样坍塌，就如乔治·R. 斯图尔特的《地球永存》（*Earth Abides*, 1949）所呈现的，斗争仍然由技术科学所设定。技术文明对抗宇宙的无力是这些寓言所要诠释的中心思想。

将科幻称作帝国的文类，并不是说科幻艺术家想要服务于帝国。多数严肃的科幻作家对根深蒂固的权力持批判态度，有时因其专制，有时因其抑制技术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科幻叙事中很少把精细的社会分析作为核心，一些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认为这个文类在本质上就具有批判性。与此形成对比，詹姆逊则认为科幻小说主题化了（实际上还模仿了）全球资本主义如何阻止辩证历史意识进化成革命意识。詹姆逊追溯西方科幻小说的根源到凡尔纳，他的作品恰好在从都市现代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间点开始出现。詹姆逊所使用的术语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不同，但从他的观点跃进到我正在提出的视角或许只需迈一小步。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持有不同见解，但支撑科幻成长的技术科学帝国和詹姆逊所描述的“消极总体论”（negative

totality）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幻已经在高度科技化的文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现代化横扫了前现代（pre-modern）甚至是“前-后现代”（pre-postmodern）的等级制和超验世界观——这些世界观阻碍了市场的理性化和技术的理性化。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致力于将这些观念替换为“多元文化”的共存，其中包括了无法消解、无法简化、难以解决的差异，目的是让这些差异绝不能演变成对帝国主权的真正挑战。普世正义和法治的乌托邦理想已被帝国的败落（corruption）<sup>1</sup>——即为了权力而不断侵犯普遍性原则（the constant violation of universality in the interest of power）——所取代。

帝国要求一切关系都成为偶然。帝国的权力正是建立在对一切确定的本体关系的破坏和分裂之上。在本体的真空中，败落成为客观和必然。败落引起了矛盾的扩散，在此之上，帝国主权滋蔓生长，稳定帝国的恰恰是它的不稳定和纯净，而抚

1 译注：此处为了和《帝国》中译保持一致，用了“败落”这个词。根据哈特和奈格里：落败一词很容易被人们误解。我们将帝国式主权界定为落败，并不是对它进行道义上的控诉，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根据落败一词在现当代的用法，它所表达的概念确实很难胜任我们的任务。当今，该词不仅涉及反常的，更含有远离道德、善良、纯洁等意。在该词的用法上，我们借用了一项在当代已为大多数人所废弃的古代用法，我们的意图则是以该词指涉一种普遍的分解或畸变过程，而不含有任何道德贬义。

慰帝国的正是它所引发的焦虑和惊慌。永久的更改和变形、泛基础论的基调、去本体式的存在，这一切因败落而得到正名。

帝国通过赠予民众一系列的主体位置和颂赞来管理他们。这些赠予貌似提供了实现统一、满足愿望的可能，但实际上却都隐藏着积重难返的败落。帝国通过在个人心灵中制造和处理危机来建立主权（迎合市场和法律秩序），这种方式正反映在帝国的赠予中。马克·博尔德（Mark Bould）认为现代奇幻小说偏执的自我建构策略，因应了强迫性地分割和变异主体性的需求。

这实则等同于在心理与审美上“抛弃帝国”，然而这种做法在科幻中的运用很有限。在其最纯正的形式中，科幻最终依赖“技术”产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科学”的本体论。技术科学霸权愈加坚实，它在虚构中就愈发寻求发现并调和更多的矛盾。因此，最具特色的帝国幻想形态可能是世界混合体（world-blends），在这种作品中，科幻的技术科学本体论会与其他类型相混合。这是日本科幻动漫中的一个广受认可的典型元素。在该文类的许多重要作品中，如《新世纪福音战士》（1996—1997）、《铃音》（1998）、《攻壳机动队》

（1995）、《银河铁道 999》（1996），非现实的权力领域或表现方式渗透进现实主义，营造了混合世界。这也是许多法国科幻（对日本科幻极富影响力）的特征。对这些作品来说，科学的合理性较之狂欢式混合和哲学隐喻要次要。很多——可能是大部分——重要的科幻作品都打破了科学合理性的严格规则，将异质的现实引入到它们的故事中。可以说，对科幻而言，管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至少和培养技术科学的神话一样至关重要。

如果我的这一假设成立，即科幻的认知魅力与帝国想象中的世界模型紧密相关，随后将会出现许多有趣的相关研究。该假设或许有助于我们确认科幻在构建更广泛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神话中的位置，并让我们洞察科幻如何在民族文化的边界与无边界秩序中无限多样的想象性共存之间架起桥梁，揭示特定的国家文化如何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以及技术如何不仅作为工具，还作为意识形态渗透艺术文化。而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假设通过向我们展示自身以帝国主义视角想象世界的程度，也促使我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来对待世界。